

近代名人日记选译

● 谭绍兴 张 浩 汝玉虎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名人日记选译

谭绍兴 张 浩 汝玉虎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周锡光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名人日记选译

谭绍兴 张浩 汝玉虎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6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日记究竟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有的认为起源于西汉，也有的认为起源于东晋南朝，但一般认为唐朝时方可能出现较成熟的日记。而公认现存最早日记篇章是唐代李翱的《来南录》。《来南录》记载作者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8）前往岭南（广东）的见闻，全文虽只千余字，但却叙述了来南的原因、行程、旅途见闻和经历等，已经明显具备日记的体制和模式。后人将《来南录》和北宋欧阳修的《于役志》均视为日记的开山之作。

宋以前，日记或称录、志，或叫行纪、日历。正式出现用“日记”二字命名的日记是在宋代，像《赵槩日记》、欧阳修的《丙午日记》、赵抃的《御试备官日记》、周必大的《癸未归庐陵日记》等，当然，更多的日记仍用别称。两宋尤其是南宋，日记不论篇幅长度，内容质量，均较唐有明显发展。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是这一时期记游的代表作品，对后世记游散文有着深远的影响。

两宋历明到清前期，日记由兴起而发展而臻繁盛。进入近

代，日记发展达于鼎盛。

胡适《留学日记·自序》（原名《藏晖室札记》）写道：这“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这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鲁迅先生也说过：“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胡适和鲁迅先生的这两段话表明，日记是第一手材料，用不着奉迎隐讳，完全可以自由抒发自己的观点、思想，无所顾忌地记载某些密事，因此，日记在某些时候的真实性反较其他文献为高。

大多数日记或多或少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或史料为一般史籍所不载，或可与其他史籍记载相互印证。或可订正其他史籍中的错讹。从这些日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正史中根本无法见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但是，也有日记是立意要写给后人看的，因而其史料价值便要大打折扣，像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就是为留传后世而写的，由于有所忌讳，日记中许多地方被墨涂过，但李氏日记生前并未如愿刊刻发表，而是在他死后由旁人集资刊刻的。

更有像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则是为掩盖罪行，欺骗世人，故所言多非事实。另有些日记纯属后人捏造，像《洪秀全日记》、《石达开日记》、《洪仁玕使美日记》、《忠王日记》等。

另外由于相当多的日记，作者是封建官僚、士大夫，其立场不同于我们，加之时代局限性，故他们的日记中也免不了会存在一些糟粕。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引为注意的。

日记这种文学体裁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由于它是一种私人著述，所以什么事情都混记在内，内容庞杂，许多时候该记的没记，而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又记了一大篇。同时，日记由于一般写得比较简略，故局外人很难全懂。王闿运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序》中就说：“惜其记事略简，非同时人莫能知其崖涘，故闿运观之了然，不能喻之人世。”而事实上王闿运本人的日记也同样记事简略，晚年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他的日记中每天就只有短短几句话，让人看不出和平时有太大的区别。由于日记多记事简略，又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给后人的阅读，理解带来不便，自然也为后人的注解、翻译工作带来相当难度。

一般来说，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回民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人民的反清革命斗争，以及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外国侵华战争。这样纷繁复杂的大变动时期，自然有事可写，有事应记。因此，日记作者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处境，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及时地记录下来，撰成了一大批集文学性和史料价值于一身的著名日记。

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全国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单位，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

也保存有为数不少的日记；另外，还有一些日记流落到了国外。这些日记，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尽管近些年来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已陆续刊行一些近代人物的日记，但发掘、整理的任务仍然很重。

近代日记比之于前代日记，又有以下两个突出的不同点。

第一，这一时期的日记，长篇巨著占相当比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些日记少则几十万字，多则百万字以上，《郭嵩焘日记》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甚至在二百万字以上，更为前代所无。

近代日记不但篇幅大，且多接续时间长，时间跨度在三十年以上者不在少数，还有不少日记许多年甚至几十年都很少间断，像曾国藩日记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三日（即曾氏死前一天），从未间断。这也实在难得。

第二，随着近代中外交往的日趋频繁，记载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出访日记大量涌现。

近代的出访日记，又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纯粹的游历日记。像张德彝的《随使法国手记》，日记中记载了作者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情况；王韬的《扶桑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则分别叙述了作者在日本、美国的诸多见闻。

另一类是单纯的考察访问日记，像王之春的《使俄日记》，盛宣怀的《愚斋东游日记》，李圭的《东行日记》，分别叙述作者使俄、游日、访美的见闻和心得。

还有一类是出使大臣的日记，即清政府派驻各国的大臣所记的日记。光绪三年（1878），清政府总理衙门规定：出使大臣

“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大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力竭力，以期有益于中国”。（薛福成：《出使日记》。）显然，这类日记并非纯粹的私人著述，而是具有半官方的文献性质。这类日记的内容以见闻为多，由于保密原因，故而日记中有关外交事务本身的内容反而较少，个人私事记得也不多。

有些近代日记同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像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观巴黎油画记》一文，是薛福成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全文不足三百字，有叙述，有描写，有想象，景物写得细致生动，感情也有跌宕起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

事实上，晚清的日记大家，许多即是著名的文学家。像曾国藩、王闿运、李慈铭、吴汝纶等均是，故而各人日记都有相当文采，尤其是李慈铭，可说就是一个专门从事日记文学创作的作家。李慈铭从二十岁起写日记，直到晚年，时间长达三十五年之久。中间只有短期的间断。他以篇幅达六十四巨册，字数至数百万的《越缦堂日记》，在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蔡元培先生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先生将李慈铭与王羲之、陆游、鲁迅诸大家并列，可见其在文学史上地位之隆。纵观李氏日记，或随记日常生活，或揭露官场丑态，或铺叙科场弊端，无不信手拈来，且文采斐然。

本书所选日记的原则是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并重，而在具体到每篇上又各有偏重。对于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都力图从所选日记中有所反映。吴大澂日记我们选了太平军攻打苏州、常州时的情况记录；赵烈文日记我们选录了湘军攻陷天京前后的情况记载；有关中法战争的史料，则选唐景崧《请缨日记》中的几则，反映的是黑旗军在越南英勇抗法的情况；中日甲午战争时候，我们选录了反映台湾军民反抗割台斗争的日记《台湾八日记》中的一天日记，还选了翁同龢日记中有关清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论争的情况记录；对于戊戌变法前后史事，我们选了叶昌炽、皮锡瑞、孙宝瑄三人从不同角度所记的有关日记；关于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情况记录，宋教仁日记中记录颇详，因此也被选入。这些日记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发生在近代史上的著名重大事件。

日记的史料价值，实际上远不只表现在平铺直叙记述各有关重大事件的概况，还在于它能最真实反映客观实际，揭露内幕，戳穿其他“史料”的假象，以补正史之不足。例如：曾长期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幕府中任亲信幕僚的赵烈文，在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七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时城中伪天王府、忠王府等尚存，余王府多自焚。贼呼城中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官军进攻亦四面放火，贼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六月二十三日日记中赵烈文又写道：“计城破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听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或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

为发指。”“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灭迹。”这里，赵烈文描写出天京城破后，湘军滥杀无辜，纵火抢劫的野蛮行径，而曾国藩在奏报中则说湘军杀太平军十余万人，纪律严明，可见纯为谎言。

另外像吴大澂日记中对清军烧杀抢掠行径的文字描写，李慈铭日记中对太平军被镇压后江浙一带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描写，在正史中均难见到。

考虑到日记内容的多样化，我们选录了林则徐日记中有关作者遣戍新疆后对新疆各地风土民情的描绘；王闿运的日记，我们选录他自湖南至四川讲学，途经三峡时的一段日记；吴汝纶日记，我们选录作者对开学堂、课程设置等属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内容，对当今教育改革也不无借鉴价值。

本书选录了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三人的几则日记，希图以此窥见这三位晚清外交家对西方政教、科技、民俗风情的认识以及他们在国家重大利权问题上的观点看法，我们也可从中了解一点上个世纪中外交涉的情况。

关于日记的分类，薛福成认为有“排日纂事”和“随手劄记”两种，近人记录的日记大多属前种类型，但也有极少数日记属于“随手劄记”。我们选录的居正《梅川日记》三则，即是这种类型，实际上是三段小故事。

本书选录的十八位近代名人日记，我们尽可能采用比较权威的版本。排列顺序按日记作者出生年份先后，对于选入的作品，我们均作一些简要的介绍提示。文中注解主要依据常用工具书的说法，有的据文意略加补充说明。对于不太知名的人名、地名、或者不作注释也不妨碍读者领会原文意思的人名、地名，我们一

般就不作注释。

由于识见有限，本书在选材、注释、翻译等方面，肯定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前 言	(1)
林则徐	
林则徐日记	(1)
曾国藩	
曾国藩日记	(17)
郭嵩焘	
使西纪程	(26)
郭嵩焘日记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41)
翁同龢	
翁文恭公日记	(55)
赵烈文	
能静居士日记	(72)